华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7年第2期 JOURNAL OF SOUTH CHINA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No. 2 2007
(第6卷) (SOCIAL SCIENCE EDITION) (Vol. 6)

感伤的爱情与女性的命运
——特奥多·施托姆小说中的人性视角

郑华玲

(华南农业大学 人文学院,广东 广州 510642)

摘 要:施托姆的小说总是和复杂叵测的社会现实保持一定距离,他将人物置于一种单纯、平和、温馨的环境中,平静而略带感伤地叙事,他在小说中营造了纯净感伤的爱情空间,并且对女性命运给予了极大关注,从而试图在小说中建立起一个充满永恒人性美的世界,谱写一曲优美的人性之歌。

关键词:施托姆小说;人性视角;女性形象;爱情空间

中图分类号:I10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0202(2007)02-0095-05

特奥多·施托姆(Theodor Storm 1817-1888),生于德国北部接近丹麦的胡苏姆,他的创作首先从抒情诗开始,大多描写宁静和谐的家庭生活,歌颂故乡美好的大自然,格调清新,其中不少篇章可列入德国最优秀抒情诗之列。但是,施托姆一生的主要建树仍在中短篇小说的创作方面。

1840年—1890年,是德国文学史上所谓的诗意现实主义时期,这是一段独具特色的文学创作时期,它介于德国19世纪浪漫主义和自然主义之间,是当时兴起于整个欧洲的现实主义潮流的一部分。这批作家回避重大的社会政治题材,认为在平庸的日常生活中也存在一个个富于诗意的因素或瞬息,他们将注意力限制和集中于这些因素和瞬息上,从而再现平庸的社会现象中的某个诗意的方面。作为德国诗意现实主义的杰出代表,施托姆的小说赢得了世界上众多读者的喜爱。在中国,他被视为"五四"以来最受欢迎、最富影响的外国作家之一。

施托姆开始创作的时代,浪漫主义已经接近尾声,在这一场轰轰烈烈的运动中,健康自然的人性受到了极大的推崇,人的价值和意义也被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这些都对施托姆产生了影响。他同时认为人必须具备自我克制的理性力量,因此他的作品总是和复杂叵测的社会现实保持一定距离。他将人物置于一种单纯、平和、温馨的环境中,平静而略带感伤地叙事,从而试图在自己的小说中建立起一个充满永恒人性美的世界,谱写一首优美的人性之歌。

一、丰富多姿的女性世界

施托姆在他的小说中对女性命运给予了极大关注,构建了一个多姿多彩的女性世界。其中悲剧气质的女性和美的天使这两类在他的女性世界中占据了主体地位,施托姆在她们身上寄托了对人性的良好愿望和深厚的人道主义情怀。

施托姆着墨最多,刻画最成功的是一些小家碧玉型的女性,她们都具有温柔善良、美丽的特质,对生活充满热爱,对爱情充满向往,可是最终却由于世俗的种种压力或者自身性格的缺陷,多以悲剧结局,作者通过这些女性的悲剧命运,批判了当时冷酷的社会现实,寄予了人道主义理想。

施托姆的早期小说《茵梦湖》使他获得了世界声誉,这部小说在"五四"时被翻译成中文,在青年中引起极大轰动,成为当时影响力仅次于《少年维特之烦恼》的外译文学名著。其中女主人公伊

收稿日期:2007-01-30

作者简介:郑华玲(1980-),女,湖北宜昌人,华南农业大学人文学院助教,主要研究方向为比较文学.

丽莎白的命运,牵动了无数读者的心弦。伊丽莎白和赖因哈特两小无猜一起长大,少年时光里,两人相守相依,懵懵懂懂中已经将对方视为一生的伴侣。两人在花园中的一段对话充满了童趣,但也隐隐预兆了两人将来的命运。赖因哈特说:"将来,等我长大了,我一定要去一趟印度。那里风光优美,景色宜人。和我们这儿比,真有天壤之别。再说,印度终年没有冬天,无论如何,你该和我一起去。愿不愿意,伊丽莎白?"伊丽莎白满口答应:"好的,不过,我妈妈得和我一同去。还有你母亲也该带上。"[1]一连串关于是否要离开母亲的争论,表现出伊丽莎白对母亲的依恋和顺从。这也是后来她婚姻不幸的重要原因。赖因哈特出门求学期间,一方面他接触到更丰富的世界,对伊丽莎白有所忽视,另一方面,家道殷实的埃里希不断向伊丽莎白献殷勤,母亲明显偏向于埃里希,不断给她施加压力,她经历了痛苦地挣扎,最终还是屈服于母亲,嫁给了埃里希。几年后,这对年少时的恋人再相见,伊丽莎白的一系列动作和神情都体现出她对这段初恋未能忘情,在最后送别时,她绝望的眼神兆示出她心中难以抚平的无奈与伤痛。

如果说伊丽莎白最终留下的是一生的遗憾和伤感的话,那么《在大学中》的罗蕾和《约翰·里韦》中的安娜,她们的命运就更具有悲剧性。

罗蕾是市长夫人厨娘的女儿,父亲是裁缝。这个平民家庭出身的小姑娘却有一种特别优美的风采,吸引了一批贵族子弟的眼光,在他们的坚持下,她作为唯一的一名平民姑娘被准许进入贵族的舞蹈班。这段经历对她短暂的人生造成了重大影响。罗蕾处于一种非常矛盾的心理状态中,一方面她认识到自己的阶级地位和处境,在和这些贵族少爷、小姐们的交往中,尽力维持骄傲和自尊,同他们保持一定的距离,另一方面,她喜爱跳舞,喜爱上流社会的交谊活动。对于痴心爱她的平民青年克里斯托夫始终不能倾心。这种矛盾的心理状态使她最终不能抗拒浪荡的贵族子弟的诱惑,却又对自己被玩弄,而且注定被抛弃的下场有着清醒的认识。她对玩弄她的人深恶痛绝,始终以一种冷漠、轻蔑的态度回应,却又无法摆脱这个漩涡,她以玩世不恭、自暴自弃的态度对待自己的生命和生活。然而她纯真善良的天性并未泯灭,在重遇少女时代曾倾心的恋人"我"时,"一阵深浓的红潮一下子在她的脸上泛起。"[2]89当"我"试图挽救她时,她悲哀地拒绝了,这种悲哀深入她的骨髓,她憎恨自己这一段堕落的时光,不容许自己去接受"我"的救助,也不愿接受克里斯托夫诚恳的求婚,她对未来完全绝望。她选择死亡来与这段堕落的时光诀别,通过死亡远离了这个引诱她的浮华的漩涡,这是一个对生活充满美好期待,却由于出身低贱,为所谓的上流社会不容,最终又为残酷的现实所戏弄的女人。

《约翰·里韦》中的安娜也是与罗蕾有相似命运的女子,安娜幼年时,父亲便醉酒而死,父亲的好友约翰·里韦拿出几乎全部积蓄,供养安娜母女俩的生活。安娜从小便是个活泼可爱的女孩,她在里韦的宠爱下成长,同时又悉心照顾里韦,给这位孤寂的人带来了无限的安慰。安娜成年后,却受到一个男爵的引诱,在最终为他所抛弃后,生下了一个男孩。孩子的出生不仅没有让安娜体会到做母亲的喜悦,反而让她沉浸在一种巨大的痛苦和悔恨中,安娜最终不能摆脱精神的重负,投水自尽。

安娜和罗蕾的悲剧,反映出当时德国的社会状况。1848 年德国资产阶级革命失败后,资产阶级和封建贵族联合起来,一方面镇压国内人民革命,一方面对外发动三次王朝战争,自上而下逐渐完成了德国统一。资产阶级开始占据上层地位,旧的的封建势力开始衰微,并逐渐没落,但是劳动人民的地位并未有所改变,他们仍处于社会的底层。安娜和罗蕾试图想要改变自己的命运,进入所谓的上流社会,这种努力不仅受到同阶层人们的嘲弄和轻视,而且最终被贵族社会吞噬,甚至为此付出了生命。

施托姆小说中还刻画了一些拥有较高社会地位的女性,她们出身显贵,然而仍然未能摆脱悲剧性的命运。典型的如《在施塔茨庄园》的女主人公安妮·雷纳。安妮·雷纳出身于显赫的贵族世家,父母在她幼年时便相继去世,祖母孤身抚养她。她从小接受严格的贵族教育,因而这种等级

意识深深地印在脑子里，这从她还是小女孩时对平民孩子冷漠的态度便可窥见一斑。然而，祖母去世后，庄园开始逐渐没落了，安妮·雷纳变得几乎一无所有，未婚夫也因此与她解除了婚约。安妮·雷纳的身心因此都受到了巨大打击，她尝试靠自己的双手生活，拒绝监护人的帮助，但最终还是不能摆脱亲人相继离开人世，爱人无情离去所带来的孤寂感，生活环境的恶化也使她不能调整自己的心态，安妮一直都生活在死亡的阴影里，在她生命的最后阶段，有着沉重的悲观厌世情结，所以她最后戏剧性的死亡，看似意外，事实上却是她潜意识中为自己选择了这条道路。临死前的那一刹那，她充满了恐惧，却无法挽救自己。安妮·雷纳的悲剧反映了当时由于资本主义的兴起，古老的贵族世家纷纷衰落，这些贵族世家的子孙在奢靡的氛围中被教育成长，在社会的急剧变动中，有一天却突然发现自己变得一无所有。他们除了所谓的优雅品味和良好教养外，一无所长，当他们失去贵族光环的庇护后，根本无法适应新的社会状况，安妮·雷纳最终也只能以悲剧结局。

施托姆小说中还有一类命运截然不同的女性，她们是天使型的人物，她们美丽、善良兼具，是给周围人带来无限爱和欢乐的女性，在她们身上笼罩的是一圈爱的光环。她们生活在被呵护和被疼爱中，同时又毫不吝惜地去关爱身边的人。《市场那边》中的索非小姐，《市政委员之子》中的克里斯蒂娜，《美的天使》中的玛丽亚，《缄口不言》中的安娜都是这类女性。

索非小姐是市长的小女儿，但她与矜持的父亲完全不同，总是热情地对待旁人，家里雇佣的老店员生病后，她悉心照顾病人直至康复，对平民的小孩也充满了爱心。克里斯蒂娜在丈夫和小叔为了父亲遗留下的花园争执不休时，从未出于私心从中挑唆，由始至终都在努力利用自己的影响力缓和兄弟俩的关系，化干戈为玉帛，避免了家庭的分裂。娇俏、活泼的玛丽亚是市长的外孙女，她凭自己的勇气和智慧赢得了大家的一致欣赏和喜爱，是典型的天使形象。

安娜的丈夫鲁道夫曾经患过精神疾病，病愈后在母亲的撮合下与教堂司事的女儿安娜相爱并顺利成亲。鲁道夫作为林务官，得到了伯爵的赏识，安娜也把家务料理得井井有条，这本是一个完美的家庭。然而，鲁道夫母子并未向安娜坦诚过往的病史，而曾经的精神疾病是否会复发一直困扰着鲁道夫，这在他心理形成了阴影，他充满了愧疚和恐惧，数次尝试向安娜坦白，却始终未拿出勇气，这种复杂的心理状况使他一度冷落安娜，并有意和她拉开距离，不明所以的安娜始终默默地付出自己的关爱，最终不顾自身安危将丈夫从自杀的边缘拯救出来，鲁道夫解除了心结，安娜重新唤回了丈夫的爱。

这些人物身上都没有背负社会的重压，也没有面临生死存亡的选择，她们多为资产阶级中上层女性，出身于优裕的家庭或者有美满的婚姻，她们体现出当时德国资产阶级充满生气的精神面貌。她们充满生机与活力，富于人道主义激情，对等级，对旧的制度以及世俗偏见不那么遵从，充满爱心地对待周边的人，虽然这种爱心也可能带有怜悯和居高临下的意味，可是相对于封建制度对人性的扼杀，在她们身上所体现出的这种普遍的爱无疑是一种崭新的面貌，同时在她们身上，也寄予了作者良好的愿望以及审美理想。作者对她们的描绘相对来说更平面化一些，这类小说读来轻松愉快，充分体现了施托姆语言的诗意和文字的灵动。

综观施托姆的小说，女性的命运一直是作者关注的重点。作者以细腻的笔触深入女性的内心，展现了她们丰富的精神世界，同时也展示了不同阶层，不同性格女性的不同命运。作为诗意小说的代表作，施托姆的小说并不以反映或批判社会现实见长，他平静地娓娓道来，然而在为逝去的生命淡淡的哀愁中，在对温情的无限赞赏中，我们感受到作者深刻的人道主义情怀，以及在女性身上寄托的对人性的美好愿望。

二、纯净感伤的爱情空间

施托姆在他的小说中用诗一般优美的文字抒写了男女间缠绵悱恻的情感，营造了一个缥缈、感伤的情感空间。施托姆笔下的众多男女为爱而生，为爱而死，虽然不乏甜蜜幸福的爱情和婚姻，

但其中以悲剧结局的占了很大比重,让读者不禁扼腕长叹。

施托姆在描写爱情悲剧时,没有通过骇人听闻的场面和刺激人们感官的情节慑服读者,而是带着强烈的情感节制,在淡化的艺术描写中,传递着对美好爱情遭到摧残的哀戚与悲伤。

《茵梦湖》中赖因哈特和伊丽莎白从小一起念书,一起游戏,度过了亲密无间的童年岁月,描绘他们二人这段时光的文字显得格外跳跃、灵动。我们仿佛看见旷野中、密林深处,追逐嬉戏的二人。赖因哈特在尚未成年时就稚气地认为伊丽莎白一定会成为他的妻子,对他而言,伊丽莎白是她青春时代发生的一切至真、至善、至美事物的象征。然而,最终伊丽莎白屈服于母亲的压力,嫁给了家道殷实的埃里希,婚后一直郁郁寡欢。赖因哈特孤独终老,伊丽莎白的照片陪他度过了一生。

《杏革莉卡》中埃尔哈特和杏革莉卡又是另一番情形。他看着杏革丽卡从一个小姑娘长成少女,这个少女牵动着他的心,然而他因为无法给她提供良好的生活环境而一直处于矛盾中,不愿她的青春还含苞未放的时候就因为他而渐次憔悴。这种矛盾使他在面对情窦初开的杏革丽卡时,感觉既甜蜜又辛酸。两个年轻人在这种愈爱不能的折磨中,逐渐陷入烦恼,互相抱着不尽的怨恨,最终埃尔哈特远走他乡,留下了无尽的遗憾。

《在圣虞庚院》中汉森终身未嫁,一直等待年少时的恋人哈雷归来,哈雷幼年时父母双亡,由汉森的父亲监护长大,两人暗订终身。这本该是一段美好的姻缘,然而汉森的父亲生意失败,居然将哈雷父亲托管的遗产也付之东流。汉森向哈雷坦诚实情后,善良的哈雷为了能让汉森父亲免受精神上的屈辱,远离家乡,另谋职业。汉森终其一生都在辛苦做活,试图替父亲偿还债务,同时也等待哈雷归来。身在异乡的哈雷虽然一直难忘汉森,却由于一系列的变故,五十年后才得以重返家乡,然而,此时两人已是天人永隔。联系汉森和哈雷的是一生不变的真情,然而阻隔两人的却是艰辛且无法预知的生活。“当我归来时,当我归来时,万事都成空。”[2]138这首歌唱出了哈雷全部苦涩的心情。

曾有观点认为,《茵梦湖》中“男女主人公的爱情,是纯粹的理想的牧歌。男女主人公爱情的不能实现,没有任何社会性背景,没有任何道德冲突,而且也没有美和爱的破灭。从一种美好的情感开始,到另一种美好的感情结束。作品把生活概括成一种个人情绪的发生和发展,而不关注那些现实的复杂的人伦关系。”[3]这是不符合作品实际的一种主观臆断,背离了作品所描写的生活的真实涵义,施托姆小说看似忧郁的笔调中隐藏着温和的批判精神,为这些被摧残和被扼杀的爱情唱出了一曲曲动人的挽歌。

《格里胡斯春秋》中欣里希和贝尔贝的悲剧发生在十七世纪。欣里希是一个大庄园的继承人,脾气暴躁,心底却十分善良,他热切地喜欢上寒微人家的女儿贝尔贝,不顾父亲的拦阻,坚定地与贝尔贝缔结了婚姻。父亲的遗嘱中表示如果他和贝尔贝结婚便剥夺他对庄园的继承权,这让他陷入了阴郁苦闷中。但他并未对自己的婚姻有所疑虑,坚决地拒绝了这些无礼的要求。然而贝尔贝在这一系列的打击中,情绪极为低落,最后欣里希的弟弟居然向法院提出诉讼,状告贝尔贝本是他们家农奴的女儿,而与农奴女儿缔结的婚姻是无效的,这个事件彻底击垮了已有身孕的她,在早产下一个女儿后,她在正值青春便离开了人世。欣里希暴怒之下在决斗中杀死了弟弟,一个人流亡他乡。

《淹死的人》中贵族出身的卡塔琳娜从小与养兄约翰内斯感情深厚,成年后,尽管卡塔琳娜始终钟情于没有任何财产的平民约翰内斯,她的哥哥却强迫她与另一个封建贵族里希结婚,这两个花花公子狼狈为奸,拆散了卡塔琳娜和约翰内斯的美满姻缘。几年后,约翰内斯在一个乡村牧师家偶遇失踪多年的卡塔琳娜,她为了让自己与约翰内斯的孩子能有一个姓氏,嫁给了这个粗暴阴沉的牧师。卡塔琳娜尽管是在严格的贵族教育中长大,但她并不缺乏反抗的精神,她在父亲死后与荒淫无耻的哥哥斗智斗勇,力图摆脱自己的处境,捍卫自己与心上人纯洁的爱情,她在被逼无奈

之下，勇敢地想要同家庭彻底决裂，然而最终还是没能成功。这对恋人在偶然的状况下重逢，卡塔琳娜已经完全失去了生气和活力，少女时代的幸福和勇气已经在她身上消失殆尽，现实折磨得她呆钝而痛苦，甚至这种重逢也没有给她带来喜悦，她像一个“没有意志的人”，满含着无尽的悲哀和痛苦，她说：“生活么？——倒是有一件幸福的事：他爱这个孩子；——难道还有更多的需求吗？”[2]248她生存的全部意义就在于养大这个与过去恋人的爱情见证，然而就在他们重逢短短的瞬间，孩子却因无人照顾而掉进水里淹死了，遭遇这样多重的打击，可以预见她的余生都将活在怎样的忏悔和痛苦中。

作者把时代背景上推了两个世纪，反映出当时封建贵族阶级和具有新兴资产阶级特征的平民之间的矛盾。约翰内斯这样一个有才能的人，因为不是贵族出身，便无权得到贵族出身的女子的爱情。作者把约翰内斯和武尔夫作了对比。后者是恶劣贵族的典型，有权便胡作非为，但却不学无术，而前者虽有才能，却无权自主。身为大庄园的继承人，欣里希同样无法自由地选择婚姻，他和平民姑娘的婚姻违背了上层社会的法则，遭到来自家族内部的无情打击，虽然他坚守自己的爱情，却无力保护柔弱的妻子。这两篇小说在反映社会现实的同时，也具有浓厚的感伤情绪。

沈从文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最关注人性的作家之一，他曾这样表述自己的文学理想：“我只想造希腊小庙。选山地作基础，用坚硬石头堆砌它。精致，结实，匀称，形体虽小而不纤巧，是我理想的建筑。这神庙供奉的是‘人性’。”[4] 隔着遥远的时空距离，施托姆同样也践行着这样的文学理想，他在小说中营造了纯净感伤的爱情空间，并且对女性命运给予了极大关注。施托姆站在历史与现实的交接处，注视着人性的尊严和崇高，独特的人性视角使其作品具有了超越时代局限的更深广的意蕴。

参考文献：

[1] [德]特奥多·施托姆. 施托姆诗意小说集[M]. 赵燮生，译. 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9：4.
[2] [德]特奥多·施托姆. 史托姆中短篇小说集[M]. 黄贤俊，译.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1.
[3] 张世君. 诗体小说[J]. 文艺评论，1988，(5)：35.
[4] 沈从文. 沈从文文集：第 11 卷[M]. 广州：花城出版社，1984：42.

Focusing on Women and Love: the Point of Humanity in the Novels of Theodor Storm

ZHEN Hua lin
(*College of the Humanities*, *SCAU*, *Guang* 510642, *China*)

Abstract: The novels of Theodor Storm are loved by a number of readers all over the world. Theodor Storm always keeps a little distance from the society, and put his dramatis personae in the pure and peaceable atmosphere. He describes sentimental love, cares about women´destiny and tries to construct a world filled with eternal healthy humanity.

Key Words: the novels of Theodor Storm; humanity; women; love